

# 乐户及相关研究综述

□ 申丹莉

乐户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是在户籍制度产生之后,社会对编入乐籍的专业乐人群体的历史性称谓,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从北魏发端,到清雍正年间被废除,前后经历了1400余年。其背景相当复杂,与封建制度下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社会组织等有诸多关联。他们出现在宫廷官邸、王宫相府、祭坛神庙、军旅民间、迎神赛社、婚丧嫁娶、风俗节庆等各种场合。乐籍制度虽然早已被废除,但作为一种从封建制度延续下来的行会组织,其内部的组织结构、活动形式及相关称呼等至今还有遗存。

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封建社会除了清代学者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和俞理初的《除乐户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外,少见专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张正明《明代的乐户》首开当代研究乐户之先河,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中国家乐戏班史》等专著对乐户有粗略涉及。乐户真正进入研究者视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山西上党地区戏曲文化工作者抢救性地发掘和整理的一批珍贵文化史料开始的。从明万历二年(1574年)到民国14年(1925年)的15种祭神仪式抄本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价值,无论从宗教学、戏剧学、音乐学、舞蹈学还是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角度,都有值得期待的视点,有关雉祭与雉戏演出的研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点,从而结出丰硕果实。

## 一、乐户研究

### (一)综合研究

对乐户的研究最为深入、详细、完备的当数项阳的《山西乐户研究》和乔健、刘贯文、李天生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两本专著。项阳全方位地考证探析乐户的生存方式、组织结构、文化信仰、社会地位、音乐特质、贡献及意义,可以说是他对以往有关乐户研究的集大成论著。《山西乐户研究》一经问世,立即在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7月获

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一等奖,《人民音乐》《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及评论。《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全书共十章,由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三人分工合作完成。两书作者对乐户关注大致都从1993年开始,以山西晋东南地区为主要调查范围,采用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的方法,但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内容自然不同。项阳从人类音乐学的角度来关注传承传统音乐的乐人,通过探析乐户的源流,梳理出一条清晰明了的乐籍制度的脉络,因其中国艺术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的特殊身份,对乐户的音乐文化特质研究得心应手。乔健等人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详尽阐述晋东南地区乐户的分布与迁徙、婚姻及师徒传承等内容,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是该书的最大看点。大概因三人分工合作完成,其书有重复论证之处,尽管如此,两书把目光投向草根社会,投向传统社会中地位最卑贱的乐人,意义自然不同凡响,其后研究者恐怕难出其右。

《山西乐户研究》之后,引发了研究者对传承中国传统音乐的乐人的关注和思考,程晖晖的《山西乐户研究之后》、刘再生《传承音乐文化永恒的生命》、张娅《乐籍制度的兴衰变迁》、夏滢洲《社会学视野下的“乐户”研究:一个自我—生态的社会组织系统》,都是《山西乐户研究》的学习札记或心得体会。张咏春的《孔府的乐户与礼乐户》硕士毕业论文,就是在项阳博士生导师指导下完成的,他探索出金代“太常礼乐人”——元代“礼乐户”——明清“乐舞生”的发展脉络,指出乐户和礼乐户是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明显差异的专业乐人群体,孔府的乐户和礼乐户是这两大乐人群体的代表者,祭孔奏乐活动是孔府乐户和礼乐户的交汇点。戎葵停的硕士毕业论文《乐户流变研究》也明显受项阳《山西乐户研究》的影响,他从乐籍制度北魏发端,一直写到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年)除籍后新时期的乐人,力求展示乐人生存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创新不够。

## (二) 专项研究

### 1. 断代研究

关于乐户的研究按朝代论述的较多。车文明先生注意到在元代出现了一类不属于贱民的庶民乐户,叫“礼乐户”,他在《元代“礼乐户”考》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他们不仅享受正常人的权利,可以应试,做官,甚至免去赋役的特权”。

因明代乐户人数众多,影响也广,研究者众。张正明先生在《明代及清初乐户研究》一文中谈到明代的乐户主要来源有三:一是降附之人,二是罪犯家属,三是被卖子女,他们的管理是在京师者统于教坊司,在各地者隶于郡县。康宝成先生《明代乐户与王府通婚现象略论》考察到王府贵族与乐户通婚现象源于皇帝的推波助澜,“淫纵”到“私娶”是藩王府贵族与乐户通婚的两个步骤,这种通婚现象制度上是禁止的,实际上情况却很复杂。丁淑梅的《明代乐户禁弛与雅俗文化的互动》认为明代乐户虽然处在政治迫害与人身侮辱的不幸遭际中,但“雅乐颂圣与俗乐娱众、屈从皇权与代言民间、依附宫廷与挑战正统,似乎成为乐户的一种群体宿命,但恰恰在宫廷文化和民俗娱乐的交叉与结合地带,他们成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信仰冲突、竞争、交融的纽带,成为雅俗文化观念对峙与交流的中介和缩影”<sup>[1]</sup>。谈到女性乐户生存地位的有冯燕群《朱有燉杂剧乐户女性生存环境论》,在朱有燉杂剧中女性乐户生存环境是极其恶劣的,她们对自己的户籍讳莫如深,地位卑贱,毫无尊严,常常三十来岁就香消玉殒。

清雍正时期对乐户来说至关重要,雍正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考虑要除其贱籍,《世宗圣》卷六载:“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发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情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厉廉耻,广风化也。”<sup>[2]</sup>虽然除籍阻力巨大,但意义却不可低估。闰钟的《雍正皇帝与乐户》和王旭的《雍正解放贱民令与中国戏曲发展(初稿)——苏州梨园会馆碑刻研究之二》都是考证此事的。王旭主要是围绕苏州老郎庙梨园会馆所存的《奉宪永禁差役梨园扮演迎春碑文》等碑文展现的苏州艺人身份之争,来说明雍正初年历次颁布的废除贱民令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意义,论据翔实,论证严密。

### 2. 信仰研究

曹飞老师的《山西上党戏神类型概说》对上党

戏曲艺人的信仰进行了分类,“乐户艺人崇祀的行业神主要有咽喉神、白眉神和律音祖师,而上党梆子艺人主要崇祀老郎神、大小老爷”<sup>[3]</sup>,这一分析颇有见地。汪宁《咽喉神:一种颇具特色的地方性戏神》考察到在山西古泽州地区共有九处咽喉神祠,此文和王群英《戏曲咽喉神考》对其祀神的缘由进行考证,但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

### 3. 个案研究

李天生的《西社王姓乐户考》考证了西社王家乐户家族的迁徙兴替,由此折射出上党乐户在清乾隆之后的执业和生存状态,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田野资料。李坤亨的《“乐户”朱氏世家》是对潞城微子镇乐户朱氏家族精湛技艺由衷地赞扬。随着这些个案文本的问世,我们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承载者——乐户必将有更多了解。

## 二、抄本研究

### (一) 综合研究

1985年山西省潞城市南舍村发现的明万历二年(1574年)《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以下简称《礼节传簿》)和1989年山西省长子县东大关村发现的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唐乐星图》等明清14种祭神仪式抄本,它们的戏曲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对这些史料进行全面详实论述的有廖奔先生《晋东南祭神仪式抄本的戏曲史料价值》,内容包括15种抄本名目,《礼节传簿》《唐乐星图》的内容结构、传承影响及文化思考,唐宋乐曲的承袭,五种不同的表演样式,剧目内容取材倾向及戏曲声腔的探讨。冯俊杰先生的《赛社 戏剧史的巡礼》认为赛社本身就是一部运动着戏剧史,中国戏剧的萌芽、形成、成熟的演变过程可以在《礼节传簿》中找到踪迹。他第一次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中国戏剧的发生发展,他说:“《礼节传簿》中的三天赛社演出,实际上走完了戏剧史的千年里程。从拜殿到舞台的节目转换,则完成了戏剧生命的创造。”<sup>[4]</sup>

### (二) 专项研究

#### 1. 演出样式研究

有关队戏的研究最多,黄竹三先生长期致力于祭祀戏剧的研究,成就颇丰。他的《我国戏曲史料的重发现——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考述》在抄本发现的初期全面考察队戏和宋杂剧、金院本、南戏以及元明杂剧的密切联系,后又对不同的演出样式做专项考证,撰有《谈队戏》《“参军戏”与“致语”考》

《上党祭祀活动的“供盞献艺”》《祭祀戏剧的流动性演出》等论文。麻国钧先生对日本演剧稔熟,他在《“行”的仪礼——“停”的戏剧——队戏源流辩》中援引中外例证,从“行”和“停”的辨证来探析中国戏剧的源流,后来在《“行”与“停”的辨证——中国古典戏剧流变及形态论》一书中,指出中国古典戏剧由行进仪礼逐渐演化而来,“行”和“停”的辨证是戏剧发生发展的规律,是中国乃至东方古典戏剧的典型特征。由祭祀产生乐、歌、舞、戏、剧的演出样式而引发的思考又写成了《供盞仪式考略》一文。廖奔先生《社火与队戏》认为社火中的行傩表演、行像表演、舞队表演、台阁表演对队戏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朱恒夫先生《队戏考论》对队戏做了历史分析,他把“队舞”等同于“队戏”,从唐代的队戏写到元明清的队戏,有失偏颇。此外,研究队戏的还有乔淑萍的《民间祭赛与戏曲的初级形式:队戏》,张振南、冀光明的《专为迎神赛社演出的队子戏》,韩树伟的《上党队戏与赛和傩》,班友书的《谈谈我对“供盞队戏”部分曲目的浅见》,日本学者矶部彰《关于〈礼节传簿〉中“西游记”队舞戏》等。

有关院本研究的有胡忌的《院本之概念及其演出风貌》,杨孟衡的《宋金古剧在山西之流变:对上党地区发现院本考辨》,张勇凤的《院本、搢戏与民间禁忌》等。

## 2. 剧目内容研究

张之中先生通过对队戏与锣鼓杂戏、元人杂剧剧目进行比对,认为队戏、锣鼓杂戏等民间社戏对元杂剧的兴起作用不可低估,在《队戏、院本与杂剧的兴起》一文中,又意识到南戏、传奇在北方的流布,在《礼节传簿》中找到18出与南戏传奇有关的剧目,写成《中国古代戏曲的南北交流——〈礼节传簿〉探索之二》。廖奔先生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剧目内容考》对剧目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完备的稽考,追寻其本事渊源,探究其流变与发展。之后,徐扶明、徐循行对其剧目进行补考,写成《〈礼节传簿〉剧目补考》。丘慧莹《再论〈礼节传簿〉中的南戏传奇》通过南戏传奇剧目的考证,探索了明代中叶剧坛演剧情况的一些情况。日本学者田仲一成著的《中国戏剧史》,其中对二十八星宿礼仪配置和剧目进行分类整理,把两抄本剧目内容分为豪侠类、仙佛类、风情类、忠孝节义类及其他,按朝代排列,条理清晰,一目了然。胡小伟、姚昆田《民间赛社中的关公戏》,都是以《礼节传簿》中的某些剧目为切入点进

行研究的。

## 3. 赛社研究

周华斌先生2006年7月15日在山西长治“山西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重要发言,称上党祭赛“是戏曲史上的活标本,是民间艺术的百宝囊”,后整理成文,在《赛社与乐户论集》上发表《祭祀与戏剧——上党祭赛的文化启示》,虽然他对上党祭赛研究只此一文,却显示了他高瞻远瞩、宏观驾驭事物的能力。他提出:

从戏剧学的角度,上党祭赛可以引发如下思考:

1 祭与戏——中国戏剧的发生和原生态戏剧问题。

2 场与台——传统戏剧戏曲的表演场所问题。

3 行与停——传统戏剧戏曲的观演问题。

4 文与武——传统戏剧戏曲的百艺杂陈和文戏武戏问题。

5 梨园与乐户——传统戏剧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问题<sup>[5]</sup>。

上党地区文化爱好者在文物普查和民俗考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寒声、栗守田、原双喜主编的《上党傩文化与祭祀戏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戏曲文化史料;李天生对戏曲文物的调查和研究更是不遗余力,他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在上党地区一共完成了151户乐户家庭的系谱与家庭现状调查,独立撰写《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的第五、六、七、八章,并对《唐乐星图》进行了校注,写了《山西赛社文化述论》《感受民间赛社的文化内涵》《赛社祭礼与乐户伎乐》等文,杨孟衡对古赛情有独钟,他的几篇论文都是针对古赛所做的调查与研究,如《上党古赛写卷十四种笺注》《上党古赛史料新发现》《三晋古赛的深层开掘》《〈礼记·月令〉傩仪考》《山西赛社乐户阴阳师厨户传记》《路城南舍调家龟》《上党古赛仪典考》等;牛其云作为乐户后人,他的《乐户职业音乐文化活动概况》中介绍他参与的乐户执业活动,也具有参考价值。

探讨晋冀两地赛戏历史渊源的有王福才的《河北傩戏“捉黄鬼”源于山西上党赛社考》通过实地考察详细描述了“捉黄鬼”的演出经过,并通过文献梳理探讨了河北武安傩戏和山西上党赛社的历史渊源。无独有偶,黄竹三的《晋冀宗教祭祀戏剧的类型同》也是论证其事的,他从祭赛仪式的过程、演出形式、剧目内容三个方面阐述了晋冀两地祭祀戏剧的相同和相类之处,并从历史、地域、民俗文化方面予



以解释。

延保全先生从道教和民间迎神赛社的关系予以论证,可谓视角独特。他认为:“道教对于迎神赛社的浸润,增强了迎神赛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迎神赛社的红红火火使各种民俗文化依附于此,得以传承流播,戏曲文化便是其中之一。”<sup>[6]</sup>赵英霞《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则看到乡土信仰在异域文化影响下带来的民教冲突。此外探讨祭赛与其它关系的还有曲六乙先生的《祭礼、傩俗与民间戏剧》,白秀芹的《迎神赛社与民间演剧》等。王能长先生的《山西方志赛文化初探——关于赛的踪迹与界别》探索山西民间祭赛活动的历史踪迹,旨在证明自唐至民国千余年赛文化在山西境内广泛存在的事实。许并生的《上党古代礼乐仪式遗存和保护刍议》提出对这种仪式遗存应加以保护,以此加快山西文化产业的运作。

#### 4. 妆扮研究

蔡欣欣《妆扮游艺中的“台阁”景观》认为:

是以“妆扮故事”为主体的台阁,继承了宗教仪仗与百戏游艺的历史传统,在庙会神诞中作为世俗与神圣的沟通媒介,在岁时节日与生命礼仪时强化过渡关口,发挥着祈福敬奉与驱邪逐疫的功能;由于台阁的动员是奠定在血缘、地缘、和业缘的社会人际网络中,因此宗亲族群、子弟社团以及商行会社的参与组织,无形中遂也搭建起联系地方情感与休闲娱乐的社会通道,而且能够产生繁荣地方、刺激商机的经济效益……从妆扮景观中即可寓意着人文世界中的秩序排列观,散发着通过吉祥、平安及长寿等赐福灵力所达成的成就寄望,也可由其中感受到的风土习俗、思想感情的反映,发挥认识史实、教化规范的功能,达到广告宣传与夸耀竞技的目的<sup>[7]</sup>。可以说这是对赛的妆扮功能最详尽的阐述。

关于“竹竿子”的研究论说颇多,较早有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任半塘先生的《唐戏弄》,都对宋杂剧中的竹竿子进行过研究。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热情似乎未减,康宝成先生在《傩戏艺术源流》里对竹竿子的来源、演变做了考察。麻国钧先生在《“行”与“停”的辨证——中国古典戏剧流变及形态论》一书中专门列“竹崇拜的傩文化印迹——竹竿子考”进行考证,他认为竹竿拂子的原发功能是扫坛净场,这一器物从祭礼走向剧场,为戏剧脱胎于祭礼仪式增加了证据。黄天骥先生把竹竿子(引戏)的淡出与戏剧角色冲末的介入联系起来,指

出这一变化实质上体现了戏曲形式和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无疑极具启发意义。此外霍建瑜的《执“竹竿子”者称谓及服饰考》,从女性的角度考证执“竹竿子”的称谓及服饰的变异。

有关乐户及相关研究著书立说者众多,但大多是戏剧戏曲研究者和少数音乐研究者,而乐户及抄本带给我们的信息远不止这些,在宗教学、戏剧学、音乐学、舞蹈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都有值得研究的视点,戏剧界和音乐界两枝争艳,其他领域呈现沉寂状态,乔健的《底边社会——一个对中国社会的新概念》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研究乐户这一阶层,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域。我们期待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草根文化将不再寂寞。

[1] 丁淑梅《明代乐户禁弛与雅俗文化的互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2] 转引自项阳《山西乐户研究》,第35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曹飞《山西上党戏神类型概说》,《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4] 冯俊杰《赛社:戏剧史的巡礼》,《中华戏曲》第3辑,1987年。

[5] 周华斌《祭祀与戏剧——上党祭赛的文化启示》,《赛社与乐户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6] 延保全、张明芳《道教与民间迎神赛社》,《中华戏曲》第20辑。

[7] 蔡欣欣《妆扮游艺中的“台阁”景观》,第179页,《赛社与乐户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